

台湾夏潮基金赞助大陆学人来台研访项目

研究报告

研究计划题目：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赴台时间：2012年9月10日至10月10日

项目完成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陆卓宁

本人获台湾夏潮基金“赞助大陆学人来台研访项目”资助并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语创系邀请，于2012年9月10日至10月10日赴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研访。现拟从四个部分做研究报告。即，一、在台期间的研访工作；二、后续研究工作；三、完成研究计划情况；四、研究成果。

一、在台期间的研访工作。

本人从事两岸当代文学比较研究二十余年，先前也因学术会议和交流曾有过两次赴台经历，但这次赴台时间相对集中和充足，因此，在台期间除了主要围绕本次研访计划内容，也兼及本人多年来两岸当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其他学术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访工作。主要有：

1、学术会议。在台期间，先后参加了两次学术会议。一、9月19日由台湾大学“台湾原住民族图书资讯中心”举办的卑南族作家巴代新书《白鹿之爱》发布暨讨论会，会后对巴代进行了专访；二、10月3日由“台湾中国诗歌艺术学会”、“三月诗会”和“台北市中庸实践学会”共同举办的“海峡两岸中秋联谊会”，并在会上根据本次赴台的研究计划内容，做了题为“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交流”的大会发言。

2、学术交流。先后与有关单位、报刊杂志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如分别在位于台北同安街的纪州庵与《文讯》主编封德屏女士就两岸的文学问题进行了交流；在位于台北市敦化南路的著名诗社《创世纪》与著名诗人张默、方明及“台湾中国诗歌艺术学会”理事长林静助等就两岸的诗歌创作问题进行了交流，大陆方面除了郑州大学的樊洛平教授外，参与交流的还有南京师大的何言宏教授、武汉大学的赵小琪教授；在台北市锦华大厦与著名诗歌杂志《葡萄园》及其诗人如台客、向明、麦穗、林焕彰等就两岸诗文活动进行了交流。另外，除了与受邀学校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人文艺术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外，还与台湾大学台湾文学所、东吴大学中文系、海峡学术出版社、尔雅出版社、人间出版社、文史哲出版社等单位进行了学术交流或参访，特别是

还获赠这些出版社的图书若干。

3、作家、学者访谈。在台期间，还就本次研究计划及相关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作家、学者访谈。访谈的作家有陈若曦、方梓、张典婉、廖玉惠、陈静娟、蓝博州、朱秀娟等；学者有曾健民 吕正惠、陈昭瑛、应凤凰 施淑、陈信元等。

4、调研活动。在台期间，还专门到高雄左营眷村及其他荣民新村进行了调研和采访，为下一步的研究搜集到了大量的素材。在返回台北途中，在台南与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教授、著名作家苏伟贞等进行了学术交流；到台南台湾文学馆进行了参访，期间与馆长李瑞腾教授进行了交流、特别参访了原住民文学展区。

此外，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及遍布台北市的大小书城、书店搜集查阅复印了大量的图书资料或购买了大量图书。这些极其重要和珍贵的学术资讯，对本次研访计划及以后的继续研究都将带来重要的意义。

二、后续研究工作。

结束了在台为期一个月的研访工作返校后，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便着手对夏潮项目进行后续研究工作。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学术演讲。

返大陆后，本人就本次赴台的学术活动分别做了四次学术演讲。

1、于2012年10月23日下午，以“从文学看台湾”为题，对广西大学文理学院人文学部师生做演讲。

2、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福州举行的“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存与阙”做了讨论发言。

3、于2012年11月3日上午，以“‘求同存异、共创双赢’视野下的台湾当代文学”为题，在由广西图书馆主办的“八桂讲坛”面向社会公众做演讲。

4、于2012年11月30日下午，以“台湾印象：文学、社会和政治”为题，对本单位，即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做演讲。

（二）、学术研究。

根据在台期间的研访和所获得的关于本研究计划的最新资讯，本人对先前申报项目时的研究计划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调整，并按原先拟定完成三篇系列论文的计划开

展研究工作。具体如下：

本研究计划是关于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拟通过对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形态异同的比较，探讨同宗同文却生成于不同的政治文化生态的二者对话的可能及其文化意义。据此，拟定通过三个方面来开展：第一：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嬗变与暗合；第二：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话”的可能与诉求；第三：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存与阙。

三、完成研究计划情况。

经过几个月来的阅读、思考和论文撰写，现已基本完成研究计划。其中，《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话”的可能与诉求》一文，已确定在《文学评论》（香港）发表；《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存与阙》一文，已确定收入《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嬗变与暗合》正在进一步的修改完善中。以上确定发表的论文已注明“本文为‘台湾夏潮基金赞助大陆学人来台研访项目’成果之一”，拟正式刊行后即寄送夏潮基金存参。

四、研究成果。系列论文三篇，见下页。

论文一：

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嬗变与暗合

如果说，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及其所被赋予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意涵，都必然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在这一历史情境下的文学提出适应其社会需要的规范和要求，而且，毫无疑问，也必然会影响到在这一历史情境下的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包括一个国家/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与发展，那么，这在很大的意义上也构成了 1949 年之后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逻辑起点。

一般意义上，少数民族文学是指产生于各民族的文学现象，它包括民族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的文学创作，还包括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等相关文学活动。本文指涉的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两岸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及其文学批评与理论建构。另则，在台湾本岛，对少数民族一般统称为“原住民”，由于本文是共时讨论两岸的少数民族文学，出于叙述上的协调性考虑，一般则称少数民族，但不排除在涉及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容中因讨论问题需要的混用。

一、大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样貌

在大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深受社会历史变革的影响。随着首任文化部部长茅盾在 1949 年 10 月号召“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①开始，迄今逐渐形成了一套符合国家学术形态规范要求的生产机制。限于篇幅，我们笼统而简要地从下面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机制。1949 年之后，大陆就开始着手大规模开展建设新型国家的工作，民族关系构架是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 1950 年开始，包括“民族识别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民间文学调查”等民族问题在内的“民族情况普查工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这对确定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成份、集结少数民族文学作家队伍、开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等提供了必要前提。于是，散落在民间的“少数民族作家便一个个、一批批带着尊严和荣耀进入新中国的文学殿堂”，乃至几乎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了各自的作家群，诸如“蒙古族作家群”、“壮族作家群”、“回族作家群”、“藏族作

^① 茅盾于 1949 年 10 月为《人民文学》创刊号撰写《发刊词》，谈及刊物的六项任务，其中第四条提出“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

家群”……等等^①；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到各地方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中央民族大学到各地方民族高校以及其他各高等院校，则集结了难以数计的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专家；除了林林总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大多开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专章外，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出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近三十部，各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简史）七十多部（有些少数民族共有几种不同版本的文学史），其中当然还包括了一些稀少民族的文学史，如《京族文学史》、《阿昌族文学史》、《毛难族文学史》、《怒族文学史》、《赫哲族文学史》、《基诺族文学史》、《普米族文学史》、《佤族文学史》等等^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则进入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同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获得了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硕士、博士的“国家学术政策”的保障；而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这些国家最高文学奖齐名的“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设立，既给出了国家意识形态下现代性方案的意涵，也确立了少数民族作家及其创作的价值标志，等等。

实事求是地看，作为国家学术形态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机制从无到有，从粗糙到完备的建构过程，对于如何平衡和协调现代民族国家（地区）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少数民族的集体幻象，有其行之有效和可供参考的积极意义。

第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自1949年后发展的大陆少数民族文学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49年至1970年代末为开拓奠基的第一阶段，1980年代年至今为活跃繁复的第二阶段。

1949年10月1日，著名锡伯族诗人罗基南在当天锡伯文版的《民主报》上发表了一首题名为《飘扬吧！五星红旗》的诗歌，诗的前两节是这么写的：“多少世纪，多少年代，/受尽折磨和欺凌的人民/都在急切地盼望着：/盼望有一天——/吉祥鸟般美丽的旗帜/飞上祖国的天空，/给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带来光明！//这一天——终于盼来了。/解放的炮声隆隆/扫荡了旧时代的臃秽，/迎来了新时代的春光。/一个旭日般光辉的新中国，/在亿万人民的欢呼声中诞生。/无数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像美丽的吉祥鸟/飞上了祖国的蓝天”^③。如果我们对大陆1950年代的诗歌语境有所熟悉的话，显然，锡伯族诗人罗基南的这首诗歌作品与同一时期的主流诗歌在整体风格上，不其而

^①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② 参见赵妍硕士论文《民族性的追寻与诉求——建国后少数民族文学史民族性缺失问题思考》附录《建国以来出版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版本概览（1949-2006）》，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07年。指导教师，陆卓宁。

^③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遇地形成了呼应，这是颇具意味的。随后，“同全国诗坛一样，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十七年里，少数民族诗歌主导倾向是歌唱光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少数民族诗歌的主导倾向是抒发悲愤”^①。

一般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心文体是诗歌，所以，我们以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为切入点，以为多少能够收到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窥一斑以见全豹的效果。

小说创作后来居上，但显然其发展走向与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大体一致。如评论界所言，“也许因为传统与文学沿袭的缘故，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一向显得相对薄弱，而且到了八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开始重新起步的时候，少数民族长篇小说仍然给人以滞后之感。但到了八十年代末，情势则呈现出一种喷薄的转机……，奇迹般地站立到了中国长篇小说世界的前沿”^②。进入到19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前一阶段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由复苏走向了一个迅速、全面、扎实地向前发展的崭新阶段，仅举一些基本数据，便可看到这一阶段的活跃与繁复。即，期间少数民族作家和他们创作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集在成十倍地增加，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有的民族还形成了阵容可观、素质颇高的作家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历次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55个少数民族已有53个民族的作者获过奖^③；而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地》等，即便是与在这一个作为全国（大陆）长篇小说创作最高荣誉的奖项中其他所有主流民族获奖作家的作品相比，其审美价值都毫无逊色，甚至还略胜一筹。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在“重写文学史”以及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强力冲击的语境下，相当程度地打破了原有的一元主宰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进入了少数民族文学审美阐释、民族身份、文化认同、“他者”、民族性、民族意识建构等问题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但是，我们也不讳言，如前述一些评论家的概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是如何“同全国诗坛一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又是怎样“奇迹般地站立到了中国长篇小说世界的前沿”？多少因其语焉不详而显得有些苍白和乏力。根本上说，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的自觉及其表达是区别于主流文学创作的意义所在，而批评主体的民族话语认知及其民族意识的缺席，将无法抵达问题的答案。实际的情形则是，与主流学界的诗学

^①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② 周政保：《抵达中国文学的前沿——新时期以来部分少数民族长篇小说读札》，北京，《民族文学》，1999年第5期。

^③ 参见李向明《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评价》，《企业家天地》（理论版本），2011年第1期。

建构意识相比，如何建立起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话语和方法仍然是当下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二、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发生与呈现

与大陆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便纳入国家学术形态机制的不同，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则是在原住民传统社会文化愈发支离破碎、族群认同危机愈发严重，从而激起原住民族知识菁英自发组织起来寻求政治舞台和民族自主权利的大背景下“破茧而出”的。其大致过程且做如下粗略的勾勒。

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台湾光复，国民党将在日据时期一直被称为“高砂族”的台湾山地少数民族改称为“高山族”，后又通令改称为“山地同胞”。大陆在1950年开始的“民族情况普查工作”中，在进行民族识别与民族认定时沿用了“高山族”这一称法，并将其识别为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个。实际上，因地区、语言及文化的差异，这一在大陆被统称为“高山族”的“少数民族”，截止目前，已认定了包括赛族、泰雅族、撒奇莱雅族、赛德克族、布农族、邵族、邹族、鲁凯族、排湾族、太鲁阁族、阿美族、噶玛兰族、卑南族、雅美（达悟族）14个族群。1984年12月29日，少数族裔的知识菁英在台北马偕医院成立了“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简称原权会），票决通过了“原住民”为台湾土著民族统称，并发表了“台湾原住民族权利宣言”。当然，作为主体精神领域中最能显现人的自由本质的文学自有其属己的发生与规律，换言之，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却在其身份获得“自主”之前。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酝酿期。排湾族作家陈英雄于1962年4月15日在联合副刊发表第一篇散文《山村》。此前有关少数族群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原住民从来都是“被看”、“被命名”的对象，而《山村》则是原住民主体第一次以“第一人称”出现在台湾的文学舞台上，这在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随后，陈英雄笔耕不辍，陆续在相关报刊杂志发表作品，目前正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这一时期还有阿美族作家曾月娥以及其他为数极少的“名不见经传”少数民族作家作品。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发展期。伴随着台湾多元文化格局的不断形成和原住民运动的兴起，原住民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积极的发展期。参与创作的原住民族作家队伍在不断扩大，作品数量在不断增长，获奖作品不断增多，主流文学

话语的关注和认可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布农族作家田雅各于 1982 年以自己的族名 Topas Tamapima 为题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拓拔斯·塔玛匹玛》一经发表在《台湾时报》副刊后很快引起广泛关注，分别入选尔雅出版社和前卫出版社的年度“台湾小说奖”；1987 年其小说集《最后的猎人》在晨星出版社出版，就以同名小说获得当年“吴浊流文学奖”，1990 年又获“赖和文学奖”。1989 年，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的诗集《美丽的稻穗》也在晨星出版社出版，这是台湾原住民第一部汉语诗集。同年，晨星出版社出版了《愿嫁山地郎——台湾山地散文选》，其中的“原住民卷”就收入了 7 位原住民作家的作品。

原住民作家自己的重要报刊杂志也大多创办于这一时期，如《高山青》、《山外山》、《山地文化》、《山海文化》、《猎人文化》、《南岛文化》等等。

第三阶段为进入 21 世纪以后。这是台湾原住民文学运动的推进期，主要表现在原有的作家队伍继续活跃并成为中流砥柱，而一大批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原住民新生代以更自觉和坚定的主体意识加入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道路上来。如鲁凯族的达卡闹·鲁鲁安、泰雅族的晷日羿·吉安、曾丽芬、卑南族的林二郎、阿美族的林俊明、布农族的乜寇·索克鲁曼、沙力浪等等。^①台湾文学馆主办的“台湾文学奖”则在 2010 年首创原住民汉语报导文学奖项，这对推动原住民文学发展无疑意义重大。

而在近年，原住民文学研究俨然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由于“原住民过去一直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民族、有关九族的各种叙述，始终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进行着，甚至连族名、姓氏亦都是被赋予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根本无法了解、探触到原住民有血有肉的主体世纪；而原住民本身，也在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结构里，逐渐丧失自己的主体性”^②，因此，台湾原住民文学运动始终贯穿着抗争与自我救赎的历史诉求。以有着“原住民尼采”之称的卑南族学者孙大川为代表的一批原住民菁英，对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的边缘处境以及日渐衰弱的危机有着切身的体验，因而“从政治社会抗争的范畴，到文化历史的评论；从族群神话、传说的掌握，到个人情志的抒发；……正以无比的毅力，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努力建构属于他们的文学的自主空间”^③。如书写语言文字问题、控诉及抗议主题审视、性别批评、身份文化认同等

^① 这部分对台湾原住民文学发展的粗略勾勒，均参考了孙大川主编的《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和周翔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文化认同》（中央民族大学，2007 年）。

^② 孙大川：《原住民文学的困境》，见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版，第 58 页。

^③ 孙大川：《原住民文学的困境》，见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

等，不论是单篇论文、专书，或者是硕、博士论文对这些议题的开发已经大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原住民文学研究的问题域，进而促使原住民的“‘主体性’不再是情感层面的呐喊，更是一种积极的建构”。^①

然而，某种意义上，所谓“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世纪”^②或许仅只是原住民作家自身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企望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及其林林总总的文学话语当中获得一份鲜明的身份标识，一个以多元性为标榜的社会是否还能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大的心力，提供给原住民文学以更大的存在与发展空间，从而改变汉原倾斜的历史惯性？这是仍然需要面对的。

三、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困厄与担当

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及其过程中的矛盾生成和交错无疑给我们展示了丰富的话语空间。大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深受社会历史变革的深刻影响，呈现出从被“收编”到获得了主体建构的可能与现实突进的流变形态。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始自1960年代的酝酿期、1980年代以后的发展期和21世纪后的推进期，也朝向了主体建构的深度开掘。作为共同与汉语主流文学相依相悖的集体想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殊途同归。但是，它也同样深刻地提示出，作为绝对主流的汉文化的“他者”，二者都共同体验到在强势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屈辱”；而全球化态势下，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主义”受到了强劲的质疑，这固然给少数族裔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可能，然而，两岸少数民族文学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都处于边缘状态。因此，如何应对主流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的权力话语的漠视，如何真正赢来“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世纪”，作为同是中华民族文化版图上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态势快速趋向的当下，仍然共同面临着无尽的尴尬；进而，也仍然必须共同面对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及其人类终极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处境的不可逃避的困厄与担当。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5页。

^① 孙大川：《原住民文学的困境》，见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1页。

^② 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页。

论文二：

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话”的可能与诉求

一、

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并置，这肯定是一个很庞杂的场域。

就大陆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国家意识形态下现代性方案层面的意义上，一直被强调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事求是地看，近三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确实获得了长足的成长；特别是文学研究，在“重写文学史”以及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强力冲击的语境下，相当程度地打破了原有的一元主宰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进入到了少数民族文学审美阐释、民族身份、文化认同、“他者”、民族性、民族意识建构等问题域，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仅就宏观问题而言，实际的情形，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定位、诗学体系、价值意义，乃至作为国家学术的基本“发声”等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在主流话语看来，也仍然是无足轻重的，民族文学界此在的思考、困惑和焦虑往往都湮没在了主流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的众声喧哗之中。譬如，2011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北京）全文登载了《2010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一文，文中第二部分以“文学评论”为题专门讨论“2010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其中所罗列并评析的重要报刊的专栏及其重要文章，没有涉及到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报刊和栏目，也没有涉及到任何一篇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进步”的文章。而事实上近年来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报刊或栏目已为数不少，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的活跃在近年也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特别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民族文学研究》，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杂志一直以来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进步”的讨论。

显然，作为国家学术形态一个方面的构成的重要性，少数民族文学也仍然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得以标识，而仍然没有能够真正获得与主流话语进行平等对话和双向阐释的可能。

在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自觉形成，大概也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政治解严前后近三十年的事，且自始至终深刻印记着原住民族知识菁英自主意识觉醒和建构的精神历程。1984年12月29日“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宣告成立，（简称原权会），票决通过了“原住民”为台湾土著民族统称，并发表了“台湾原住民族权

利宣言”。“自我命名权的争取成了原住民参与汉人主导的政治领域的第一步”^①。

随后，“我们终于能看到原住民作者，尝试以主体的身份，诉说自己族群的经验，舒展郁积百年的创造活力。原住民各个族群，正试图以他们文学和艺术的想象力，以他们厚实、质朴的生活智慧，从‘山’上的石板屋，‘海’里的独木舟，走向全世界”^②，并且，由于台湾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少数民族文学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其书写策略、身份认同、族群记忆、生存境遇、主体建构等问题，都突出地构成了彼此共同的诉求对象，因此而赢来了“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世纪”^③。但是，由于少数民族问题真正“浮出历史的地表”也才是晚近的事情，因而，原住民文学的历史阐释权、如何在历史重构中找寻民族文化身份的定位、如何在台湾地区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确认属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并获得与之平等对话的完全可能，等等，所有这些关涉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问题仍然是引而难发，甚至也同样湮没在主流社会各政治文化利益集团话语权的角逐之中。

二、

显然，将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并置，固然庞杂，但是，却也不难让人辩识其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可供彼此“对话”的历史前提。

这就在于，一方面，1949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对两岸随后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多么深远和巨大，但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版图上，作为绝对主流的汉文化的“他者”，——两岸少数民族所共同承注的边缘性、封闭性以及被言说的文化胎记，却没有得到过根本性的松动；另一方面，在愈显广阔而复杂的全球化态势下，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主义”受到了强劲的质疑，这固然给其他少数民族裔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可能，但是，以“与生俱来”的边缘、封闭、落后、乃至愚昧的弱势，以及只能是、也必须是一己之力来与其他强势文化一起应对全球化的裹挟和冲击，则更凸显了作为少数族裔本身的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诚如大陆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我要寻找/被埋葬的词/……它是母腹的水//……是夜空宝石般的星星//……是祭师梦幻的火/它能召唤逝去的先辈/它能感应万物的灵魂//我要寻找/被埋葬的词/它是一个山地民族/通过母语，传递给子孙的/最隐秘

^①陈昭瑛：《文学的原住民与原住民的文学》，见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版，第 196 页。

^②孙大川：《山海世界——〈山海世界〉双月刊创刊号序文》，见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版，第 52 页。

^③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版，第 1 页。

的符号”^①。

台湾著名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也说：“……我们的姓名/在身份证的表格里沉没了/……我们还剩下什么？/在平地颠沛流离的足迹吗？/我们还剩下什么？/在悬崖犹豫不定的壮士吗？//如果有一天/我们拒绝在历史里流浪/请先记下我们的神话与传统/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请先恢复我们的姓名与尊严”^②。

两岸少数民族诗人在汉语主流文化以及全球化强力态势的逼迫中，不约而同地擎起了主体建构的自觉。在这里，既隐喻着作为“他者”处境的少数族裔在强势文化的夹缝中生存所共同体验到的“屈辱”和“遭遇”；还透露出，即便是经历过 1949 年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即便是因为两岸根本不同的社会体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而存在“经验”与抒张的差异，但是，作为同是中华民族文化版图上的少数族裔，其共同的命运和遭遇仍然在实质上有着根本的一致性，这当然就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虑。换言之，在全球化态势快速趋向的当下，两岸少数民族文学共同面临着无尽的尴尬和不可逃避的困难，这当然完全构成了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话”的可能，并或可能从一个侧面探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态在当下世界文化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问题。^③

三、

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态中确立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可能与诉求，不论是事理逻辑本身还是国家/地区意识形态构成，都有其毋庸置疑的现实必要与历史需求。但是，如前述问题的提出，这一抽象命题的社会践行与实际“操作”，无疑都会遭遇到来自其外部与内部的困扰，两岸皆此，尽管各自都有其自身的问题。

因此，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社会价值理性、大众传媒的话语转移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且也已经在实际上构成了当下社会各政治利益集团以及各少数民族都必须共同面临的社会文化生态，那么，围绕着少数民族文学生存与发展的诸多问题，作为同是中华民族文化版图上的少数族群，鉴于历史的共同“经验”，显然都无不同样地只能由其自身所承担，这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态中“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可能与诉求”的重要前提，也是唯一有效的思想路径。

其集中表现为：首先是对边缘处境的体认与“出走。这里包括了所处地域、文化

^①吉狄马加：《吉狄马加诗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②莫那能：《美丽的稻穗》，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1-13页。

^③

发展层次、文化内部结构以及文学话语表达手段等多重向度的边缘性^①，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发生、发展与传承必然受到边缘地域政治和历史语境的影响，受到人类社会发展各社会群体间本身存在不平衡性规律的制约，也决定了各少数民族在其内在心理结构模式、精神实质等层面多停留在较为单一、质朴、原始的层面。但是，已经很难想象，在当下各种异质文化剧烈碰撞的全球化态势中，民族或族群还能够孤立地存在，还能够用一种刻意的方式来保全自我某种单一的文化特征，或某种单一的精神系统。譬如，语言文字对人类文化传承意义重大，是人类一切文化建构的基础。而大陆与台湾整个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虽然如藏族有藏文、蒙古族有蒙文等、以及阿美、排湾、雅美等族群有教会传教士制定的罗马拼音文字，不过，这些文字并未获得广泛流通或只能在本民族交流——因此，往往都被认为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但是，诚如少数民族学者孙大川所言，“我常有一种感觉和疑惑，当我们坚持必须以‘母语’来从事文学创作时，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掉进了‘母语主义’的陷阱？母语的丧失固然是一个民族的不幸，但民族经验的记忆、累积、传递的散播，却不一定完全依赖母语来达成。……相对于意义和经验本身，语言文字终究只是一种工具。”^②著名藏族作家阿来则说，他的成功一方面是在于自己对本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开掘；另一方面是通过汉语言从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并把自己的故乡放在世界文化这一大格局，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进行考量与思想。^③可见，少数民族能够体认并审视边缘处境的事实存在，摒弃褊狭静止的民族文化守成立场，努力导向变革和超越，才可能“出走”边缘，实现真正有效的“精神突围”。

其次是民族文化认同与主体建构的根本解决。哈尼族作家莫独说“不敢相忘的，是自己的族名”，^④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说“从‘生番’到‘山地同胞’/我们的姓名/渐渐地被遗忘在台湾史的角落”，¹⁷“族名”无疑成为少数民族群能够于强势话语中把持自己的重要标识，但是，虽然大陆少数民族文学的“族名”问题主要解决的是如何使“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能够真正融入“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的国家学术视野，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族名”问题则在于“控诉其实是一个普遍的主题”，我们还是

^①参见罗庆春《转型中的构型——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当代转向》，重庆，《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8期。

^②孙大川：《原住民文化历史与心灵世界的摹写》，见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3-24页。

^③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参见《民族文学研究》（北京），2001年第3期，第5页。

^④转引自晓雪：《红河上空闪亮的群星》，北京，《民族文学》，2000年第2期。

可以断言，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文化认同构成突出问题的当下，唯有“族名”显然不够。换言之，“无论你血统里流淌着怎么样的与生俱来的民族的血液，无论你如何地敬畏和热恋自己的民族，作为作家，既然思考与写作作为你的生命形式，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你就无可“逃避”地首先是一个现代人，而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身份。……你只能是也必须是一一以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作家身份去面对现代社会中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人类终极的各种问题和处境。”^①

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对话”，当然是一个很庞杂的场域，但是，从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态着眼，其所可供言说的话语空间当无限可能且无不意义。

^①陆卓宁：《身份意识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北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7年第8期。

论文三：

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存与阙

比之主流文学话语无可置疑的“法统”地位，不论是大陆的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便得以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来进行组织，还是台湾原住民菁英的自我崛起，实质上都是一个救赎/建构的过程，期间彼此所呈现出来的“经验”，足以引起我们的审视和反思。

两岸的情形，大致都可以从1980年代之前后的两个阶段来看。

（一）1980年代之前的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及其辩证

在大陆，经由新中国初建，国家文化部便发出“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的号召，到1960年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老舍作《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热热闹闹地进行创作，这一政府机构、文学团体和作家个人三位一体的共同努力，“少数民族文学”不论是作为一种符号还是成为一种象征，其所预设的意义都获得了很好地满足，即“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和作家队伍的迅速成长，充分证明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正确性”^①。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绝对正确的“政治阐释”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表现。

一如1950年锡伯族诗人罗基南的《飘扬吧！五星红旗》与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少数民族诗歌与主流诗歌在整体风格上不其而遇地形成了呼应，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究大多如出一辙。创作上，往往是借助一个发生在民族地区的故事的外壳，传达的则是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及其历史观、阶级观；同样，研究方面，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及其文本的民族性想象从来都不可能构成阐释的着眼点。譬如，著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1952年创作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讲述的是一个草原姑娘只身追捕潜逃的反革命分子的故事，而被认为是一篇“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优秀作品^②。著名壮族作家韦其麟1957年创作的现代长篇爱情叙事诗《百鸟衣》，写的是聪明勇敢的青年古卡爱上了美丽能干的姑娘依婁，可是蛮横的土司抢走了依婁。勇敢的古卡爬了九十九座山，射了一百只雉鸡，做了一件神奇的“百鸟衣”，

^① 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见玛拉沁夫、吉狄马加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1949-1999]·理论批评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第11页。

^② 《人民日报》：《文化生活简评——〈人民文学〉发表了两篇优秀短篇小说》，1952年1月28日。

救出了依俚，杀死了土司。由于诗歌是根据壮族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所改编，因此，其故事本身包括人名、地名、民俗以及情节的传奇色彩等民族元素极其浓烈。但是，它却是以这样的面目进入了文学史：“作品生动地刻划出这一对勇于反抗的青年人的坚强，赞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暴露了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的贪婪和愚蠢”^①。顺理成章的，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座谈会，据会议纪要所言，“目前社会上迫切需要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的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要强调劳动人民的创作，强调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②。于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很快形成热潮，且为着表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这些文学史最终大多以割舍民族个性为代价，强调的是各民族间的共性，追求的是与主流文化共同“与时俱进”。比如《蒙古族文学简史》的编者就直接表明：“我们在编写《蒙古族文学简史》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种民族间历史与文学艺术的共同性是时代演进的必然结果，……从而也有力地证明了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民族之间广泛开展文化交流的无比重要性，……强调这点，不但有利于祖国各族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发扬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对于各民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也会产生积极作用……”^③。

如此等等。在一个“政治阐释”和“阶级分析”成为基本准则的社会语境里，少数民族文学唯其主动纳入了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并成为其特定的表达，而获得了主流话语的亲睐。然而，在这里，所谓少数民族文学的“无比重要性”无异于被供奉起来的神祇，在徒有“名节”的背后，题中应有的民族性、民族意识、民族主体认知已然沦为了巨大的盲区。

大抵同一时期的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的表现也是颇具玩味的。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为了应对其严峻的政局不稳、经济凋弊的处境，在“反攻复国”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下，国民党当局采取了多项重大的社会管治与改革的措施，其中也包括对“山地同胞”的管治与改革，并分别于1951年、1953年和1963年颁布了“山地施政要点”、“促进山地行政建设大纲”和“山地行政改进方案”等多个政策。这些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在根本上无疑关系到了原住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①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6页。

^② 仁钦道尔吉：《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的一些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1984年内部印刷。

^③ 额尔敦陶克陶：《关于〈蒙古族文学史〉编写的几个问题》，北京，《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原住民传统的部落形态结构完全被迫纳入到国民党当局统一的行政官僚体系，致使原住民传统的经济模式、生活习俗、语言符号、乃至宗教信仰等自然文化生态受到很大的冲击直至解体。

显然，在这里，看似也把少数民族问题纳入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而给予重视，但其目的不是要进行民族识别并给予保护，恰恰相反，是要实现“山地同胞”“平地化”的“同化”乃至“灭绝”的目标。孙大川就认为国民党所推行的原住民族政策是“以‘人为’的手段；加速了台湾原住民的社会、文化之崩解，使他们失去了一个缓冲以及自我调整的机会。‘山地平地化’的政策，对原住民而言，实乃藉山地社会、经济现代化之名，行民族同化之实。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丧失了民族认同的线索，原住民还有存在的可能吗？”^①

我们借助排湾族雕刻家撒古流的回忆，便可设想这一阶段被“污名”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处境。他说：“完全烧毁、摧毁文物，禁止讲母语，文化认同已经倒转过来了！……那时我才上国小五年级，我还帮祖父把雕刻品搬到派出所烧掉”^②。而权利话语对“山胞”采取“文化灭绝策略”的严重后果不仅在于摧毁了他们这些有形的物质文化，更在于还摧毁了他们对“自我”的认同和坚守。这些痛苦的心理路程，作为原住民知识菁英的孙大川就曾深刻地反省道：曾经，在许多族人的心里，使用本民族的母语，也以为是一种落后和野蛮的表现，母语和他们的民族一样，都让他们感到耻辱和沮丧^③。换言之，“弱势族群”的“他者”形象不仅被强势话语所制造，而且也可能被“弱势族群”自身所认同。台湾学者魏贻君就认为，阿美族作家曾月娥“一方面在面向族群文化的传承之时忧虑自己及族人‘随着时代的潮流，随时在改变自己。改变得好可怕，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另一方面在面向平地的汉人文化社会之时以重词审判族人‘肤浅、自私、贪图物质享受、爱慕虚荣。做事没半点长远规划，没有创建，自卑感太重’”^④，排湾族的陈英雄则直言，“……能籍着我的秃笔，照耀到文化落后的山地里去”^⑤，言语间的卑微感显而易见。

如此，在直至 1984 年原住民运动兴起、“原权会”^⑥成立这一长达二十多年的时

^① 孙大川：《夹缝中的民族建构》，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9 页。

^② 参见瓦历斯·诺干：《荒野的呼唤》，台中：晨星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64 页。

^③ 孙大川：《夹缝中的民族建构》，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4 页。

^④ 魏贻君：《战后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南，台湾国立成功大学，2007 年，第 213 页。

^⑤ 陈英雄：《旋风酋长—原住民的故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 190 页。

^⑥ 1984 年 12 月 29 日，少数族裔的知识菁英在台北马偕医院成立了“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简称原权会），票决通过了“原住民”为台湾土著民族统称，并发表了“台湾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自我命名权的争取成了原住民参与汉人主导的政治领域的第一步”，陈昭瑛：《文学的原住民与原住民的文学》，见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

间里，即便如陈英雄、曾月娥等唯数极少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能够获得关注，其前提也是，“他们的共通点在于使用改易的汉名发表，发表的场所局限于地方报纸、小型机关期刊，发表量较小，更重要的是，书写的内容尽量隐没族群的记号，一如‘污名的认同’，以至于在考察这一时期的原住民书写时，台湾主流书写中心与原住民书写呈现著相当一致的‘空白’与‘漠视’的状态。”^①

诚然，在两岸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社会权力的结构关系也是不同的，因此，彼此少数民族成员所体验到的来自主流话语的权力“压迫”也存在本质的区别。大陆的生产关系形态是面向包括少数民族成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因而，其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在场”的“缺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文化意义层面的支配与被支配、主导与服从的关系问题；而在台湾，由于国民党“在政权飘摇之际，反共成为所有政策的主调……”，因此，其所推行的“山胞平地化”政策就在于“强化民族观念，强力灌输反共思想，压抑本土意识，而对于原住民就直接采取同化的文化灭绝策略。”^②因此，其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不仅在于面临文化层面的“被灭绝”，还在于在政治上如何为自己争取获得“命名”。

（二）1980年代之后的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及其辩证

进入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与全面转型，台湾地区的政治解严也带来了“松软的历史环境、饱满的主体自觉、多元文化的价值肯定”^③的社会氛围，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大潮则强烈地诱发出民族、宗教、种族等诸多后现代语境的问题，这一深刻而驳杂的历史态势，给两岸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重新思考与建构提供了完全的可能。事实上看，两岸此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也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活跃与深入，并在过程中逐步于自我主体的确立、逐步于民族文化“想象”的深入开掘与民族审美阐释体系的确立。但是，问题的事理未必都是顺理成章的。在一片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一种喷薄的转机”或“文学的创世纪”的欢呼声中，依然难掩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乖戾或尴尬，两岸皆此。

在大陆，突出的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的自我消解。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想象”是在主动而急切地自我去除民族的本性以逢迎

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96页。

^① 瓦历斯·诺干：《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去殖民》，见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39页。

^② 浦忠成：《原住民文学发展的几回转折》，见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7页。

^③ 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页。

主流话语的接纳及其趣味；那么，在民族意识高涨的当下，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文学“想象”仍依然在主动而急切地“包装”自己，以迎合主流话语的关注和期待。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在竭力的“去民族性”，后者则是在刻意地为自己制造“民族性”的美妙或诡谲，即便是现代意识相对自觉的作家有时也概莫能外。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笔下神秘的荒原和巫术、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笔下诡谲的大森林与狩猎文化经验……。不否认，少数族裔初始的本真生存状态及其所形成的风俗民情，作为民族审美心理和生命情态的物化形态，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始初的真实面貌，但是，“对原始生活，……没有进行冷酷的一刀切的否定。恰恰相反，而是对愚昧中的人类精神和旧有价值作了诗一般的赞美”^①，实质上是在无意中从一个方面成为了强势话语文化理性的补充。第二，主流话语新一轮的误读。某种意义上，主流话语也仍然以二元对立文化格局中绝对强势的“积习”来巩固自己在多元文化格局的霸主地位，对于弱势文化或边缘文化的阐释仍然一如既往的居高临下，即便对少数族裔笔下的另类风景表现出“热情”，其原因也在于这些另类风景极大地满足了他们对异质文化的陌生化期待心理。第三，国家意识形态现代性方案的“漠视”。2011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2010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一文，文中第二部分以“文学评论”为题专门讨论“2010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其中所罗列并评析的重要报刊的专栏及其重要文章，没有一个栏目，也没有一篇文章是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进步”的。事实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民族文学研究》，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杂志一直以来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进步”的讨论。显然，作为国家学术形态一个方面的构成的重要性，少数民族文学也仍然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得以标识，而仍然没有能够真正获得与主流话语进行平等对话和双向阐释的可能。

在台湾，则表现为：第一，“命名”的实现与主体建构。1984年原住民为自己争取到了“命名”，这或许可称之为一个“文学的创世纪”。但由于长时期的被“污名”，如何在历史的乡土文学经验与现实的政治生态中确立主体的独立性？显然，为自己的“命名”还远不是主体建构的完成。孙大川就认为，从原住民的立场看，过去汉人社会所谓的“本土化”，本质上仍未脱离“政治地理学”的范畴，不论其谁先来后到，文化的同质性或心态逻辑的一致性是极为明显的。因此，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努力，如果未反省到或故意忽略原住民异质性文化的存在，那么其“本土化”概念终将局限

^①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在排斥、对抗的氛围中，无法提升到多元、包容的层次上，包括原住民文学也将仍然成为政治的附庸。^①第二，文学想象的充盈与现实处境的逼迫。原住民文学从“平地化”与文化灭绝记忆的重围中获得突围，顺理成章的，“控诉其实是一个普遍的主题，流露在所有原住民作者及其作品中，显然这是台湾原住民共同的历史经验。”^②由于历史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重生”的原住民文学如何使自己的精神状态、心理情绪和审美意识充盈地通过属己的“民族性”获得抒张，显然还受制于诸多非文学的因素，至使文学想象成为了另类的“政治考古”。第三，历史阐释权的可能与精神重构的艰难。同样由于历史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如何确立历史阐释权及其策略，直接关涉主体建构的充分与否。撇开语言文字相关的“技术层面”问题不计，口传文学与部落经验能否担当得起？守成而封闭的传统文化能否转变成为参与现代化进程取之不尽的话语资源？进而，原住民文学话语的历史阐释与精神重构目前无疑仅限于原住民菁英，如何使其成为所有“族人”、乃至主流文化都共同参与的“共同体”而避免其最后沦为一种学院式的研究行为？因由殖民地经验、原住民历史的支离破碎以及全球化经济强力入侵的多重困境，与当下世界多元格局中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这一问题对原住民文学话语尤其来得突出与艰难。

显然，两岸少数民族文学不同的现实处境与“经验”都共同指向了同一问题：在如何顺应社会变革中完善民族主体建构，反之亦然。且处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多元文化相互渗透与融通的当下，这一问题比起其他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来得更为深重与紧迫。

参考文献：

1. 姚新勇：《追求的轨迹与困惑——“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的反思》，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2.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台北，INK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① 孙大川：《原住民文学的困境》，见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7-58页。

^② 孙大川：《文学的山海，山海的文学》，见孙大川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评论卷（上）》，台北，INK 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88页。